

永吉文史資料

第六輯



政协永吉县宣教文史委员会

永吉文史资料

(第六辑)

(朝鲜族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永吉县委员会

文 史 委 员 会

封面设计 李明山
主 编 于长河
副 主 编 张敏华
编 辑 李 彦

永吉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政协永吉县宣教文史委员会编
永吉县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9303033号

1993年12月20日工本费4.00元

目 录

历史渊源..... 武殿福

民族起源..... (1)

迁入永吉..... (5)

生业开发..... (7)

奋起革命..... (12)

发展经济..... (35)

民俗风情..... 曹玉霜

生 活..... (41)

生 产..... (54)

节 日..... (59)

教育文体..... 刘文和

教 育..... (65)

文 体..... (74)

礼仪信仰..... 刘文和

礼 仪..... (92)

信 仰..... (100)

历史渊源

武殿福

一、民族起源

朝鲜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西汉时期，在东北境内的高句丽族（句，音gōu）日益强大，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曲折复杂。

高句丽，或作高丽。高句丽名称之来源，学术界说法很多。或以为“山高水丽”、“高大黑马”、黄铜、高城等等，皆附会之说不足信。近年来有人提出高句丽是“秽貊一音的语根转化衍出”，此说与其族源有关，或可能是正确的。

高句丽是秽貊族系的一个支系。《后汉书·高句丽传》记：“句丽一名貊耳。”貊耳，即貊、秽貊也。古籍记载，高句丽王族出自扶余，“为扶余别种”。《后汉书·高句丽传》记：“高句丽，……东夷相传以为扶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可是高句丽的广大民众，则是秽貊族系的另一支，即考古学所说的积石墓文化民族——高句丽族。高句丽族即是古籍记载的高夷。《逸周书·王会篇》记：“正东高夷。”《孔颖达疏》云：“高夷，东北夷高句丽。”汉昭帝时（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74年），玄菟郡“徙郡句骊西北”，“以高句丽为县”，昭帝赐衣帻、朝服、吹鼓，常从玄菟郡受之。这里提到的高句丽县，其管辖的民族，即是高句丽建国前的高句丽族，亦即《三国史记》记载的沸流国人。高句丽建国时（古代的国的概念，系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权），遂取其族名为国号。

高句丽建国，还有一则近似扶余族的族源神话故事——朱蒙

建国的传说。

光绪六年（1880年），吉林省集安县发现高句丽好大王碑，此碑建于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是高句丽长寿王追念广开土王而建。此碑记载了高句丽始祖朱蒙（邹牟）创业的经过。集安下羊鱼头发现高句丽人《牟头娄墨书墓志》，该墓志对这个传说也有片断记载。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高句丽长寿王遣使至北魏朝贡，遂将这个建国传说传到了中原。《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了这个故事，而且更为详尽。《三国史记》也有记载，情节大致与《魏书》相同。

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大意是：西汉时期，扶余王解夫娄老而无子，便去祭告神山，祈求生子，乘马至鯢源，见两块大石头流泪，王命手下人移动大石，得一小儿，象一只金蛙，带回王宫，立为太子。金蛙与河伯之女柳花成亲，因感日影而孕，生一卵，扔给猪、狗，猪、狗不吃，扔在大路上，牛马躲开走，扔到野地里，群鸟用羽覆盖，拾回家，有一男孩破壳而出，七岁就会制弓，射箭百发百中。扶余人称好射手为朱蒙，也叫东明。朱蒙与父兄不和，在母亲的帮助下，带领乌伊、摩离、陟父三人南逃，渡过淹淲水（今辽宁境内太子河），行至毛屯谷，又收下穿麻衣的、穿衲衣的、穿水藻的三个贤人，一同到纥升骨地（今辽宁桓仁五女山）立都，建高句丽国。

建高句丽国时，朱蒙年22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岁为甲申，即公元前37年。

最初在辽宁省桓仁县境，后至吉林省集安县，并跨有鸭绿江两岸及长白山一带，远至吉林市。

高句丽是中原王朝管理下的地方国家政权，从汉朝起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藩附”关系。

王莽篡权后，为示威力于外夷，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遣王威将到四方颁发印绶。所谓颁发印绶，即加封高句丽一为

王，授给印信。这是高句丽做为地方政权臣属中原的最初记载。后来王莽加其罪，“更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

东汉初年，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帝复其王号”，即封为高句丽王。

高句丽在汉朝时由玄菟郡管辖。《后汉书·高句丽传》记：“〔高句丽王〕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

高句丽进入阶级社会后，开始用武力与东北各民族竞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的武装与曹魏幽州刺史毋丘俭、鲜卑族慕容氏在辽东展开激烈的角逐，互有胜败。

广开土王时期（391—412年间），高句丽国的势力最为强盛，领地也最为宽广，占有今吉林省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

自高句丽故国原王三十一年（369年）南伐百济，两国之间争战不已。广开土王进军百济王城，夺得了原带方郡的领地。广开土王的儿子长寿王，即位十五年（427年）迁都平壤，国内城（今集安）从此成为高句丽陪都。

隋、唐时期，高句丽臣服于突厥族，经常“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见《隋书》高丽传），加深了同隋、唐王朝的矛盾。隋、唐多次与高句丽发生争战。唐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兵败，被取消国号，辽东地区收归唐王朝统一版图。

辽东是箕子分封之地。其渊源是：箕族集团初居山东，后来其中一支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上游。在殷商初期，箕族集团的一个支系，逐渐向东迁徙，渡过辽水，扩散到辽东，进入朝鲜半岛。

殷商时代辽东的居民，是箕族，不排除这个可能：箕族是秽貊之先，后演变成秽貊。

箕子是殷商末期纣王的大臣，官至父师，是个才能出众的人，他与微子、比干，同被称为“殷代三贤”。箕子因劝谏纣王而被监禁。武王灭殷后，释放了箕子，箕子东走，建立了国家，

后来武王予以加封，史称为箕氏朝鲜，即古朝鲜。

西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灭箕氏朝鲜自称王，史称卫氏朝鲜。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派兵灭掉卫氏朝鲜。古朝鲜国连同古朝鲜族都成了历史名词。汉武帝在古朝鲜设置了郡县，高句丽是中国境内居住这个区域内的一个民族。魏晋以后，高句丽乘中原分裂之机，“侵其封场”，“入其郡县”。隋唐统一后对高句丽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无数次民族战争的一次，但又是我国历史上统一战争的组成部分。

此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族日趋衰落。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东北的过程中，也同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公元10世纪初，朝鲜半岛统一为高丽王国，自称高丽族）建立了关系。由于高丽国内部争夺政权，高丽贵族李成桂于元中九年（1392年）废高丽王瑶，自立为王。李成桂为了讨好明王朝，遣使朝贡，并上表请封，主动要求废除高丽国名，恢复朝鲜国名，称李氏王朝。从此，高丽族更名朝鲜族。其时，移居辽宁省凤城、海城、盖县一带的高丽族居民，数以万计，和汉族、女真族杂居，仍称高丽族。

明代东北居民经常移居朝鲜半岛，如满族先世建州女真人就曾在朝鲜半岛居住一个时期。朝鲜王国的居民也经常移居中国东北，甚至远徙中原。明代辽东总兵李成梁，其“高祖英，自朝鲜府内，世授铁岭卫金事，遂家焉”（《明史》李成梁传）。据李成梁的祖传家谱记载，他们的先人从朝鲜半岛移居铁岭，至李英一辈，已是第六代人了，至李成梁已是第十代，故称铁岭人。究其实，他们应称为明代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李成梁的子侄在明王朝当官的很多。

明王朝对移居中国境内的朝鲜族采取保护措施，使他们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在农村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可见早在

明朝，朝鲜族就已入居中国境内，成为一个跨国民族。

二、迁入永吉

明末，李朝曾出兵配合明王朝政府来镇压女真族，吃了败仗，许多朝鲜官兵被俘，充当女真族的奴隶和佃户。

清初，女真贵族对朝鲜进行报复，但很快和解了。许多朝鲜居民继续向我国东北迁移，有的朝鲜人甚至迁到吉林将军辖地宁安县一带居住。尽管清王朝对其发祥地实行封禁，朝鲜居民仍然成群结队越过豆满江（图们江）开荒种地。仅嘉庆年间，朝鲜平安道人口就减少二十多万，其中一部分来到了我国东北。清同治八年（1869年），朝鲜北部发生大饥荒，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朝鲜饥民，扶老携幼，不顾禁令，纷纷移居我国境内。翌年，仅鸭绿江北岸就出现了二十八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年），定居在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已达一万多人。光绪九年，集安、临江、新宾等县有三万七千多朝鲜族人口（《见增补文献备考》卷36）。同一时期内，乌苏里江流域也有许多朝鲜农民相继定居。

清朝统治者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解除封禁，迁入东北的朝鲜居民越来越多。为了抵制沙俄入侵，清王朝曾和朝鲜李朝政府订立条约，放宽朝鲜居民入境的政策，并将图们江北岸长约七百里、宽约五十里的地带划归朝鲜族专垦区，为朝鲜族移民我国东北大开方便之门。朝鲜族居民移入东北形成了高潮，有一部分朝鲜族居民从宁安（当时归吉林省管辖）一带向舒兰、磐石（当时归伊通州管辖）、永吉迁移。移居在永吉境内的朝鲜族居民在鳌龙河、团山河、五里河、忙牛河沿岸开水田有三千多亩。

当地的居民称迁入的朝鲜族为高丽人或韩人。称高丽人，是因朝鲜族历史上曾叫高句丽，后改高丽。称韩国人，则是1897

年，朝鲜李氏王朝君主李熙为了“振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朝鲜，维持李朝的封建统治，决定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简称“大韩”或“韩”，建元光武。

1910年8月，朝鲜卖国贼李完用等人勾结日本政府签定了《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李氏王朝遂宣告灭亡。至此，“韩国”这个国号名也不复存在了。此后，朝鲜国名一般恢复为朝鲜。由于习俗上的原因，时至今日，还有人称“韩”人。

大批迁入永吉的朝鲜族居民，是1910年。当时，朝鲜亡国，日韩合并，促使移居东北的人数剧烈增多。他们迁居的原因：大部分是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和统治而来的一些不甘当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不甘枉为臣仆决心光复国土的心理，亡命东北。192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企图以东北延边地区为侵略跳板，遂驱逐大批朝鲜居民来中国，甚至全村移居东北，他们“扶老携幼”，行乞于途，沿鸭绿江和豆满（图们）江两岸，辅辇于东三省，不过20年间，竟达200万上下，这就是“世称二百万”的历史。

在这再次迁居的大潮中，迁入永吉县境内的朝鲜居民猛增，他们在一些地方建立了村落。聚居较早的朝鲜族村有江密峰的二道、三道、三麻沟；太平的新安村和杨家大桥；大岗子的东响水河子、西响水河子；双河镇的大河川、石人沟；五里河的三家子村；大绥河的搜登河村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除了从日本国内迁徙一部分农民到东北的农村，建立开拓团外，还强迫朝鲜居民迁入东北，企图改变东北居民的组合成份。永吉县迁入者数量倍增，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永吉县的朝鲜族人口已达40527人。饮马河流域的金家、万昌、官厅及岔路河流域的岔路河，松花江流域的乌拉街、土城子等

地也遍布朝鲜族的聚居点。

到1992年底，永吉县有朝鲜族人口5万多人，分布全县各地，较集中的乡镇是：土城子、双河镇、江密峰、桦皮厂、岔路河、搜登站、乌拉街和口前镇等。

三、生业开发

朝鲜居民迁入永吉时，正是封建王朝腐朽、没落、黑暗之期。清朝统治者把朝鲜族居民视为“外化之民”，只准许在荒草地，踏甸子，沼泽地，涝洼地开垦，不给朝鲜族农民土地所有权。朝鲜族移民辛勤地开垦的肥沃良田，全被当地封建地主和早期迁入的个别朝鲜族地主所霸占，广大朝鲜族赤贫农民却沦为他们的佃户或雇工。

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封禁政策，永吉境内地广人稀，许多沃野满生荆棘，亟待开垦。后来虽然解除了封禁，从直、鲁、晋陆续迁入一些汉人，但数量不多，许多肥田沃土仍然沉睡。朝鲜族移入后，荒滩僻壤开始苏醒了。迁徙的朝鲜族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每到一地架木结茅为庐，临泉择溪定居，条件十分简陋，夏不避雨，冬不御寒。每到夜晚，上盖草袋子下铺草，合衣蜷缩等天亮。进风漏雨的茅草屋内空空如也，唯一的家当就是从朝鲜背来的碗、筷、勺子、铁锅之类。搬家时只需一个木背夹子，就可以把家产全部运走。

尽管如此，他们不畏劳苦，不避艰险，刨草甸子，挖水渠，修池埂子，引水灌田种水稻。用辛劳和汗水使昔日的漂伐地、荒草地金黄一片，结出珍珠般的稻粒，碾出白花花、油汪汪的大米。含辛茹苦的朝鲜族农民却享受不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大部分被官吏和地主吞噬了。少部分卖掉换回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粗陋的生活用品，过着挨冻半饥的生活。

饥寒难不倒勤劳的朝鲜族人民，他们春季在有冰楂的涝洼地里开田，脚包破布足蹬草鞋，冷的瑟瑟发抖，用笨重的铁镐挖水渠，修池埂子。原来的不毛之地，经过朝鲜族农民的一番惨淡经营，变成了田成方、渠成趟的良田。统治阶级对朝鲜族的辛劳刻苦精神，大加贬斥，他们讥讽地说：“高丽棒子（一种民族歧视的语言）不仅能干，而且常年在水里干活，练就了“抗冻”的本事，咱们人就不行。”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朝鲜族群众对永吉农业的开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永吉的肥田沃土，每年秋季收获黄澄澄的稻谷，都凝结着朝鲜族群众的血汗。

朝鲜族群众用勤劳的双手，开垦荒滩、洼地为良田，引进水稻种植技术，应该永远镌刻在史册上。据史料记载：“清末，由辽阳迁入河湾子前鸭河的朝鲜族叫安炳，他用简陋的工具，在前鸭河的河滩草甸子里，甩开膀子斩草刨地，硬是一锹锹、一镐镐开出几池水田。秋天，安炳的田里的水稻金灿灿、黄澄澄，装点着这荒沟、河滩，一改过去荒凉景象。当地汉族群众对朝鲜族的吃苦能干精神，惊叹不止，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到了民国时期，又有6户农民迁入前鸭河，在草甸子、漂伐地里挥锹抡镐。

据现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朝鲜族农民回忆，1911年迁入永吉县江密峰二道沟的金龙浩、崔炳青合伙给姓丛的汉族人开水田20余垧。金赫、朴基述、金连必等人也先后来到靠山屯、卞家屯一带开水田140多垧。崔万浩、李亚善、张明德、李京福等人也在下江密峰、西杨木等地开发水田一百垧左右。1922年由张师亿、李圭东等人带领70多户朝鲜族农民在太平新安村成立水田公司。他们动手搭起茅草房，安置好家属之后，租用地主的草甸子、柳条通子200多垧，修坝挖水渠，新安屯开天辟地以来，二百多垧的闲荒地长出茁壮嫩绿的水稻。同年，在太平杨家大桥以姓金的为首的15户朝鲜族，租种地主的50多垧涝洼地，改为水田。

1925年朝鲜族农民李基八，在岔路河佛堂（现团结村附近）

开发水田50多垧。1927年前后在岔路河流域的东响水河子、西响水河子、石人沟、苇子沟、三家子、官地、大岗子等8个村的朝鲜族农民200多户，斩草填塘，开发水田300多垧。金元锡、玉致衍等30余户朝鲜族，在前后老虎林子的沟汊和荒甸子里，开垦水田70多垧。1928年权重哲等8户朝鲜族移民在大岗子五间房附近，开垦水田20余垧；李圭东等30多户朝鲜族，在大岗子南响水河子，以“三一”农场的名义开垦水田80多垧。1929年朝鲜族农民张复三等7户，在沈阳的涝洼地里挖沟排水，不分昼夜拚命苦干，开垦水田20多垧。1933年朝鲜族农民金斗千等10户，在双河镇大河川开垦水田30多垧。同年，成浩英等20户朝鲜族农民在双河镇开垦水田30多垧；南春宇等10户朝鲜族农民，在春登乡开垦水田30多垧。

周相烈、南显镐、金光镐等二百多户朝鲜族移民在阿拉底落户，在当地地主弃之不用的低洼存水的地里，挖沟排水，刨荒叠堰，拚出命也要把这片存水只长荒草的洼地，开垦成良田。当地的地主对周相烈等朝鲜族的战天斗地精神嗤之以鼻，说高丽人太傻了，这么一片人下去陷脚、牲畜下去拔不出腿来的臭哈塘地，只能养蛤蟆，怎么会长庄稼呢！到了秋天，二百多垧过去只能听蛤蟆叫的荒芜洼地，被一片金黄色的稻浪取代，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摇曳，给无人问津的蛤塘地增光添采。饥笑朝鲜族农民是傻狍子的地主们看后，惊得瞠目结舌，对朝鲜族农民不得不刮目相看。

1934年，李圭东率120多户朝鲜族农民迁到万昌，办起永新农场。在饮马河沿岸开垦水田300多垧，采用新技术栽培水稻，向永吉各地传授水稻的种植方法，出售水稻的优良种籽。对水稻在永吉各地的栽培，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朝鲜族移民来永吉后，刚开始只能在小山沟、小溪边开垦水田，数量很少。后来当政者和封建地主，从朝鲜族群众种植水稻

中得到不少好处，为了即得的利益也采取一些措施，对朝鲜族开垦水田、种植水稻放松了禁令，使水稻的种植逐步发展起来。1903年以前，永吉县的水田只有3000多亩，到1930年发展到19000多亩，1945年永吉县已有水田14万多亩。

朝鲜族对永吉水田的开发，是在长满荆棘处处是陷阱的艰险路上，拚死拚活地冲过来的。可以这样说，每一寸良田都灌注朝鲜族农民汨汨的汗水；每一粒稻谷都溶解着朝鲜族农民殷红的鲜血。开垦的水田，是汗与血的结晶。

恶劣的自然条件，没有吓倒坚韧不拔的朝鲜族群众；而人祸，却使朝鲜族群众付出血的代价。

迁入永吉的朝鲜族群众，受到官府压榨、地主的盘剥外，还要遭到兵匪的洗劫。朝鲜族群众开垦水田的地方，多是偏远的山村，穷乡僻壤之地，正是土匪为非作歹的渊藪。土匪进屯后见啥抢啥，耕田的牛、拉磨的驴统统拉走，壮年男子被绑走，限期用钱往回赎，如果交不出钱，被绑走的人别想活着回来（土匪叫撕票）。土匪走了，军阀政府的大兵又来了，他们明为剿匪，实为打劫。朝鲜族群众杀牛宰狗，摆酒设宴招待他们，招待得稍不如意，这些丘八老爷就要捣毁房屋，抓走村民，还给安上一个莫须有的通匪罪名。还有更甚者比土匪还凶，进屯后抓鸡牵牛，抢走大米，强奸妇女，无所不为。奇怪的是，土匪越剿越多，1932年夏天，在永吉双阳交界一带活动的土匪一次就打死朝鲜族群众70多人，在东响水打死七八名贫苦群众。

兵匪的暴行，逼得这些地方的朝鲜族人民无法立足生存，纷纷逃走。有的逃往吉林、长春等地，有的逃回朝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鲜族同胞和汉族、满族及其它民族一样，同样遭到侵略者残酷的蹂躏，血腥的镇压，生活更加暗无天日，死亡时时在呼唤着。

政治上，日本侵略者为了严格控制朝鲜族人民，施行集团部

落。在部落周围挖深壕、筑高墙，墙的四角修炮台，在部落内安插秘密警察和自卫团监视居民活动。出入凭证件，10户编为1牌，一人“犯罪”全牌连坐。对保甲连坐制稍有触犯，就家破人亡，朝鲜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根本没有保证。

经济上，以日本人移民搞“自警村”为名，大量掠夺朝鲜族人民的土地。在双河镇日本自警村侵占土地177垧，占开垦水田的百分之六十。失去土地的朝鲜族农民，沦为日本人的雇工。日本人对雇工剥削的非常苛刻，规定一个雇工每年得种两垧水田，劳动强度相当大，最忙时一天得劳作18个小时以上，到了年终连口粮都挣不够。

朝鲜族农民的水田、水源控制在自警村日本人手里。日本人把田灌饱了，才允许朝鲜族农民使用水。天旱了别想用水，朝鲜族农民动用水，自警村的日本人就开枪射击，格杀勿论。

朝鲜族农民种的水稻大部分出荷，出荷粮的价钱不及市价的一半，每年剩下的不够填饱全家人的肚子。广大朝鲜族农民对出荷粮是深恶痛绝的，采取挖坑深埋、搭夹层墙等办法藏粮，对抗出荷粮。此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费，如：什么户税、保甲费、村会费等还要往已经承受不了的朝鲜族农民身上狠狠地刮。这些都得从水稻里出，剩下那一点点填不饱肚子的口粮，又被征用一大半，朝鲜族群众只能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

最为残酷的抓劳工和征兵。一旦被抓当劳工，修秘密仓库，劳役繁重，吃的是橡子面和发霉的包米碴子，累病了卧床不起，则以传染病为名活活被埋掉。征兵也把朝鲜族群众逼得走投无路，17岁至21岁的男子，必须无条件的应征，被征就意味充当炮灰，许多青年在战场上死于非命。

屋漏偏遭连天雨，人祸已逼得朝鲜族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各种疾病也为虎作伥，凶猛地向朝鲜族人民肆虐，这等于雪上加霜。霍乱、痢疾、疟疾、克山病在朝鲜族聚居的村屯时有发生，

一些营养不足、劳累过度的朝鲜族青壮年被疾病这个恶魔吞噬掉，英年早逝，抛下孤儿寡母，无法生活。克山病在五里河、旺起、大岗子一带流行、泛滥，最为猖獗。朝鲜族的茅草屋低矮、潮湿、空气污浊，是克山病滋生的温床。许多朝鲜族农民全家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患病后口吐黄水，急性的症状不到两个小时就咽气了，慢性的症状也只能维持一天的生命。有的全屯全家人死绝（俗称窝子病），无人殡葬。

文化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族实行奴化教育，学生上课不准学朝鲜族语文，日常生活中必须讲日语。朝鲜族群众去“配给所”买粮买物品，都得背诵“皇国臣民誓词”，背不下来或忘背诵者，处以罚款或劳役半天至一天。日本侵略者为了同化朝鲜民族，强逼朝鲜族改换日本人的姓氏，不准朝鲜族人民穿本民族的服装。

朝鲜族群众象大雪覆压下挺拔的青松，以旺盛的生命力，在疾病、人祸的摧残下，顽强地生活着。

历史上，“七个高句丽战士能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满万的高句丽兵，无敌也。”迁入永吉境内的朝鲜族人民，不愧为是“勇猛、坚韧、勤劳”祖先的后代，只要有一口气在，他们就象祖宗们斗虎、杀敌那样，开发永吉的荒沟和草甸子。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使大片的沼泽地、草甸子，变成了哺育人民的肥田沃土，为永吉县发展水稻的种植，奠定了基础。

四、奋起革命

朝鲜族人民在永吉及全民族的解放斗争中，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民族解放的历史丰碑，是永吉各族人民的血肉铸成的，其中也凝聚着朝鲜族同胞的鲜血。

最初，迁入永吉的朝鲜族被称为小作农，社会地位十分低

下。除了政治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保护”，又受到中国军阀的统治和压迫。另外还要在韩国反动团体国民府、新民府势力的控制和束缚下受二房东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他们对革命要求异常强烈，除了革命外别无出路，尤其是反日情感特别浓厚。因此，从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他们的强烈愿望。

反对奉系军阀的腐朽统治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其革命成果却落在北洋军阀手里，而东北地区则逐渐成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永吉县历史悠久，地处吉林督军府吉林市的四周，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奉系军阀把其视为禁脔。从1924年起，奉系军阀及其吉林省官府加紧推行对朝鲜族的限制，实行取缔以及驱逐政策。1927年8月，吉林省长官公署颁布“关于厉行赤化可疑朝鲜人取缔令”，同年10月又颁布“朝鲜人取缔及移住禁止训令”。

日本侵略者在军阀政府的纵容下，为镇压永吉境内朝鲜族群众的反日斗争，长春日本领事馆、磐石县日本特务机关，不断派特务、走狗到朝鲜族聚居较多的五里河、双河镇等村屯频频活动，对参加进步活动的朝鲜族群众进行恐吓，并向军阀政府告密。一些朝鲜族青年被抓走，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打得奄奄一息。

军阀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在永吉的罪恶活动，引起居住在永吉各地的朝鲜族同胞极大的愤慨，他们自动地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推举首领，拿起棍棒、土枪、鸟铳，袭击军阀政府的警察署、日本特务及其走狗。

与奉系军阀进行斗争，表现得突出、坚决的朝鲜族头面人物有：金乐三、李圭东、金定一、申甫等。

永吉境内的朝鲜族同胞与奉系军阀的斗争，虽然有组织、有首领，斗争时敢于拚命。终因势单力薄，在军阀政府血腥地镇压